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的深度宣传功能

梁葆莉

(国家图书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北京 100081)

〔摘要〕在制定《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体例的过程中,编委会将如何纳入时代精神放作为重要任务,反复讨论如何在导读、选篇、注释和点评各部分,体现出时代性、大众性,保证通俗性,从而确保发挥时代精神的宣传作用。在书目遴选时,在古代科技类、四大名著、古代别集、先秦两汉典籍、贴近生活类典籍以及一些专业类典籍的选取过程中,体现出对民族精神文化的深层宣传功能。在解读人遴选过程中,注重解读人的学术权威性、人品威望、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实为对知识分子理想形象的深度宣传。在撰稿过程中,解读人自觉担起“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使命,斟酌时代主流思想与学术研究的平衡,写出具有时代性的学术著作,在审订过程中,解读人与审订专家互相切磋,寻求时代精神、学术研究与个人风格的平衡,展现出学术界对时代精神的思考与探索。

〔关键词〕百部经典;编纂;宣传

〔中图分类号〕G25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671(2023)—02—0127—08

DOI:10.13792/j.cnki.cn45-1300/z.2023.02.002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以下简称《百部经典》)是国家图书馆近年来承担的一项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在编纂体例、书目遴选、样稿撰写与审订、初稿撰写与审订等各个环节,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性,还具有较强的大众性、通俗性,这种将学术性、大众性、通俗性融为一体的编纂工作,在客观上具有较为深入的宣传性,本文主要探讨《百部经典》编纂工作过程中体现出的深度宣传功能。

一、《百部经典》编纂体例的时代精神

古今字词含义和句式皆有差异,古代经典的阅读和理解并非易事。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普及传统典籍,学术界做了大量的工作,点校、注解、翻译、评析各种方式皆有,成效甚为显著。到了新时期,当党和国家将这一重任交给《百部经典》编委会时,显然饱含着新的时代性期许和要求,为此,《百部经典》项目自2016年正式启动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酝酿、讨论和制定编纂体例都是编委会的中心任务,要编一套怎样的书?怎样的编纂方式能更好地体现时代精神,这些问题长久地萦绕在编委们的心中。经过前期各级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和多次调研,编纂目标和宗旨渐次清晰:“本丛书的编纂既要突出其学术权威性,更要体现其时代性和大众性。编纂工作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指示为指导,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精选精编的基础上,进行大众化、通俗化的解读,本着服务当代、面向未来的精神,激活经典,熔古铸今。”^①有了编纂目标,接下来就需要制定编纂体例了。

(一) 编纂体例产生过程中的时代性

编纂体例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一个不断讨论、逐渐成熟的过程,而这个酝酿、不断讨论的过程,实则是对于时代精神一次次的呼应。初次提出的编纂体例,一开始就是编纂委员会内部对于编纂工作中如何体现时代精神的探索,可谓编委会内部的宣传。在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讨论编纂体例:“题目:《×××选读》;内容:说明、回望经典、元典精髓、原文和延伸阅读这五个部分。“说明”是对该书依据的版本、遴选原则、篇章结构等信息的介绍。“回望经典”重在诠释该书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

〔收稿日期〕2023-01-06

〔作者简介〕梁葆莉,女,陕西长武人,国家图书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

①《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手册》,2016年5月24日。

义。“元典精髓”属全书正文，原则上由导读、原文、注释、大意和阐释等部分组成，按照主题思想模块进行节选、注释、阐发。“延伸阅读”部分由作者推荐3至5本相关图书书目信息。”^①这是最初的设计，但完全可以看出这套丛书从一开始就注重用普及经典的方式揭示经典的现实意义，即“激活经典、熔古铸今”，这就是编纂工作的“初心”，后来的编纂体例改动较大，但这一“初心”贯穿始终。

在编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修改过的编纂体例，更加注重现实性。确立了“导读、原典”的内容框架，导读部分要包含“原典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还要包含原典的“当代价值”。以经编委会审定通过的若干注本作为撰稿人编纂底本，撰稿人在此基础上进行简注简译。简注的要求是“撰稿人对所选的原典进行随文注，如用今人的白话注解，应加以精选或提炼以适应篇幅的要求；如用古人的注解，则须加以改写，以适应通俗化的需要”^②。简译的要求是“根据今人理解难易程度进行简译，而非句句译”^③。沿着第三次会议的方向，在第六次编委会会议上，补充了科技类图书的编纂体例。“在导读部分，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书中内容，就该书所属学科的内涵、其在我国古代的发展脉络加以介绍。若原文节选原则应去芜存菁。注释部分，重点解释和串讲古代科技的专有术语、名词、概念和原理。尽量做到明白晓畅，深入浅出。点评部分主要是解释本篇的思想内容和当代价值。可运用现代科学的原理解释我国古代的科技理论，尽可能反映学术界的现有水平，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所存在的不足。增加配图及图解，加强读者理解。”^④如此规定，只有一个目的：更易为大众所接受。

经过多次讨论，编纂体例越来越具有时代性和大众性。2016年12月16日，第七次编委会会议召开，充分讨论了编纂方向。比起前几次，这次讨论的问题体现了多重含义。第一，更明确地彰显时代性。在这次编委会会议上，对于导读有明确的要求，导读中要“着重阐扬典籍的学术贡献，特别是其独具的思想史、文化史意义，对其学术史成就及其历史地位予以评价，同时则应努力挖掘和阐发其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让读者充分了解典籍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引导读者思考典籍的当代价值和意义”^⑤。这份编纂体例蕴含的时代精神不言自明。第二，更符合大众的阅读习惯。确定每部书篇幅在15万至20万字，当下读者生活繁忙，阅读时间有限，部头太大会令读者生畏，篇幅太短又引不起阅读兴趣，这个字数正好。第三，更准确地把握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多年重视传统文化的社会风气下，现在读者对于典籍的理解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全文逐字逐句的翻译并不是普通大众的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自己不理解的字词与句子的意思和对文意的分析评论。在这次编委会会议上，编委们经过分析讨论，将以前体例中的简注简译调换成注释与点评，满足了大众的阅读兴趣。第四，更符合大众的阅读水平。每部书有一个2万至3万字的导读，这样长篇幅的导读在普及类书中并不多见，大多数古籍普及类图书，介绍典籍的整体情况，一般是两三千字的简介而已。用两三万字的文字介绍典籍的作者生平、主要内容、成书情况、版本源流等情况，即使是从未听闻过该典籍的读者，也会借此对此经典有全面了解。另外，现在图书市场非常庞大，各种典籍的解读本，林林总总，但现在的读者也不盲目购买了，知道找个好版本来读，《百部经典》关于原典录文版本的选择原则是：既重视目录学所推重“善本”，又不唯“善本”是从，而是选择史有定评的晚近注释本或当代名家的整理本（含今译本）作为底本。^⑥如此，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既通俗又权威的版本，非常贴近大众的阅读水平，其中的宣传效果不言自明。

（二）编纂体例对语言规范化的生动宣传

编纂体例的制定，不只是对丛书内容的规范，也包含对解读所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要求。编纂体例

①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手册》，2016年5月24日。

②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手册》，2016年6月28日。

③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手册》，2016年6月28日。

④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会议手册》，2016年11月21日。

⑤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手册》，2016年12月16日。

⑥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手册》，2016年12月16日。

要求注释简明扼要，在学术水准上居于前沿地位。注释的重点是历史典故和疑难字词。历史典故不只是指成语，还应包括典章、制度、职官、天文、地理、年号等。对疑难字词（含多音多义字）的注释，除简明释义外，还应对难字加注读音（用汉语拼音）。在没有今译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疏通文意，提倡多作句意串讲。一般的字词解释可以融入串讲，以此减少出注数量，而在串讲之后，仍可以对其中的难点另行出注。注释中引用底本或古人的成说，不必另做说明，但若引用他本文字异文，尤其是今人独到的研究成果，则应一一交代原始出处。可以说，编纂体例对语言的规范性要求非常高，这样的读本是对规范使用现代汉语最好的宣传。

编纂体例还是对严谨学风的宣传。在第十三次编委会会议上，讨论编纂体例中的注释格式：（1）原典录文每篇应予分段，注释可在每段之后，前可标示[注释]栏目。（2）注释所用注码，一律采用方括弧形式，注码位置在句末标点之前。（3）注释应一句只用一个注码，一句中所注不止一处，也须在一个注码下进行，各注可以接写。（4）两个注码之间，可空一格接写。（5）几个句子的串讲，其注码可标在起始句下，注文可用“以下几句是说”领起。（6）串讲各句中的疑难字词，可在串讲后接写。（6）单独注某一字词，字词下使用冒号。串讲后出注某一字词，字词下宜使用逗号，因为“以下几句是说”前的提示语已使用过冒号。（7）注释典故，可转述大意，一般不须摘录原文。（8）导读、注释、点评中引用他人独创的意见，原则上应注明出处。古籍的出处有时很复杂，最简单的要求是，常见书（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可以只注书名和篇名，不必注卷数，而类书、总集、笔记、丛札等卷帙略繁，则应连同卷数一并注明。如果出处放在正文中显得冗杂，可在书后列参考书目，加以交代。^①如此精细的格式要求，是对当下常见文风、学风的纠偏，也是对严谨学风的正面宣传。

二、《百部经典》书目遴选的时代性

遴选书目是《百部经典》编纂工作的重要内容。选什么样的书纳入《百部经典》，就会出版什么样的书，读者就会读到什么样的书，意味着推崇和彰显什么样的文化，所以书目本身就发挥着舆论引导的作用，遴选书目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入选《百部经典》的典籍，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在2016年4月8日举办的座谈会上，刘奇葆同志曾谈道：“书目选择要体现广泛性和多样性，做到百花齐放。儒释道都要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生态等内容也都要有，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不仅要选取哲学思想经典，也要注重吸收一些生活类、科技类、技艺类的典籍，像国画、书法、军事、天文历法、茶道等内容。”“这些内容展现了我们先人的生活智慧和审美风范，与今天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传统文化融入当下生活很好的切入点。”^②这个可以看作官方的期待，是宣传的核心精神。在第七次编委会上，讨论并通过了选目思想：“本丛书立足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经史子集四部要籍和四部之外的其他典籍，从中慎重选择在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等各个学术领域，具有重大思想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一百部经典著述，经过精到的诠释，向全社会各界广大读者推荐。”^③充分体现出选目思想的时代性。

（一）遴选古代科技类典籍，呼应阅读潮流

《百部经典》选入古代科技类典籍是对时代阅读潮流的敏锐捕捉与宣传。在新时期，大众开始关注古代科技类典籍。2015年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引发读者对《肘后备急方》的关注与兴趣，古代科技类典籍越来越自然地进入大众视野。《百部经典》并非赶潮流，而是因为古代科技类典籍是《百部经典》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遴选出古代科技类典籍，编纂工作办公室受编委会主任委员委托，组织了自然科

①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手册》，2017年11月28日。

②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手册》，2016年5月24日。

③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手册》，2016年12月16日。

学史研究领域内相关专家了解古代科技典籍,咨询备选书目。在第五次编委会会议上,讨论遴选科技类典籍书目,分析了《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齐民要术》《水经注》《开元占经》《茶经》《梦溪笔谈》《营造法式》《王祯农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海国图志》共13种典籍,还讨论了《周髀算经》《脉书》《食疗本草》《武经总要》《新仪象法要》《农桑辑要》《康熙几暇格物编》共7部备选书目。在第六次编委会会议上,补充讨论了《武备志》《数书九章》《救荒本草》3种典籍。为此,编委会一共讨论了23部古代科技类典籍。最终遴选出《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齐民要术》《水经注》《梦溪笔谈》《营造法式》《王祯农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海国图志》11部典籍,这11部典籍涵盖了数学、医药学、农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多个学科门类,不但能够满足大众对于古代科技的了解,还是对古代科技成果的得体宣传。

(二) 遴选四大名著,宣传健康阅读风尚

四大名著可以说是老少皆知的经典,是大众阅读的重要书目,《百部经典》自然不会回避。组织召开关于四大名著编纂工作专家咨询会,讨论了四大名著作者署名、底本选择和校勘、学术性与普及性完美统一、注释的详略繁简程度以及在《百部经典》现有体例(导读、注释、点评、旁批)框架下,更好地解读四大名著的最佳方式等一系列问题。^①经过充分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四大名著的解读遵守丛书的编纂体例,在字数上可以灵活处理,同时,为了更好地走近大众,在选篇时要关注大众感兴趣的回目,但底本选择要精良,注释要准确,点评和旁批要精到,要保持解读内容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对于网络文化中近年流行的玩“梗”等倾向及戏说、穿越等娱乐方式,不趋同、不跟风,我们不戏说、不穿越、不玩“梗”,保持对经典的敬畏,这就是《百部经典》的四大名著编纂思想,也是对新时期四大名著阅读和研究风尚的有力宣传与引领。

(三) 遴选古代别集,弘扬民族精神

《百部经典》选入大量别集是对中华民族宝贵精神文化资源的宣传。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涌现出大量光辉灿烂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人格形象及作品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肥沃的文化土壤,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成为我们民族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塑造着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结构,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最生动的宣传。《百部经典》选入《李白集》,让读者能感受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人生信条;选入《杜甫集》,让读者能领略到“安得广厦千万家,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心怀天下的胸襟;选入《陶渊明集》,让读者感受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恬淡自适;选入《苏轼集》,让读者感受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旷达;选入《韩愈集》,让读者体味“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政治理想……这些璀璨夺目的作品,是真善美的统一,选入这些作品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为动人的部分推荐给读者,用这些有魅力的文人来召唤人,用这些可与日月争辉的作品来感化人,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宣传教育,这就是“以文化人”,即是最深入人心的宣传。

(四) 遴选先秦两汉典籍,探索文化之源

《百部经典》选入的作品中,先秦两汉的作品占比相当大,这种深入中华文化源头的遴选方式体现了较深刻的宣传理念。2017年,作为《百部经典》重点推出的第一批图书《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管子》《孙子兵法》《史记》,全为先秦两汉作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放在编纂的首要位置,让读者追根溯源,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认识到我们文化灿烂与辉煌的开始,从而找寻到文化之根,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在后来的多次书目讨论中,先秦两汉入选作品所占比重都比较大,在第二十七次编委会上,讨论并确定的书目中,先秦作品20种,秦汉作品33种,先秦两汉

^①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四大名著编纂工作咨询会会议手册》,2019年6月14日。

的作品有33部,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样的书目遴选思想,召唤着大众在建构自己的阅读框架时,向上追溯,让自己的知识体系更富有深度,这是对大众阅读方向的深入宣传。

(五) 遴选贴近生活的典籍,引领大众生活新风尚

《百部经典》还选入一些贴近生活的典籍,这为大众提升生活品质作了生动的宣传。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大众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了,人们会注重健康养生,会思考家庭教育,规划休闲旅游,打卡博物馆、美术馆欣赏书画作品……《百部经典》敏锐地体察到大众的阅读需求与热点,遴选出《黄帝内经》《伤寒论》,将中国养生健康的经典呈现给大众;推出《颜氏家训》,将古代最具智慧的家庭教育范本带给大众;《徐霞客游记》里文字隽永的山水游记唤起大众对远方的向往;在第九次编委会会议上,从11部艺术类典籍中,讨论了《历代名画记》《乐记》,在第十次编委会会议上,又讨论了《古画品录》等典籍,最终向大众推出了《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引导读者如何更好地欣赏古代书画作品,成为一个有艺术眼光的现代人。在近几年的宣传中,主流媒体倡导人们要过上时尚、符合潮流而又有文化气息的生活,《百部经典》遴选出的这些贴近生活的典籍,就是对此倡议的深层呼应。

(六) 遴选专业类典籍,深入推介传统文化

《百部经典》遴选的作品,不仅贴近大众,还有“向上一路”的追求,选了一些大众可能觉得生僻、读来觉得困难的作品,这既是对提升大众阅读能力的引导,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宣传。选入王弼的《周易略例》,借此领略易学的丰富与深奥;选入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依据丛书体例,更名为《耶律楚材集》),借此了解少数民族的见识与智慧;选入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和王骥德的《曲律》,借此感受民族音乐的精深与绚丽;选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感受先贤对古代政治制度的反思和民主思想的萌芽;选入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展示为学之道;选入阮元的《畴人传》,呈现古代天文历算的辉煌。这些典籍被选出来呈现给大众,告诉人们除了《论语》、老庄,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很多值得去读的经典著作,引导读者去读自己以前不知道的經典,由此进入浩瀚的中华典籍与文化之中,这才是国家对于大众的期待,不断学习和领悟我们国家深厚的文化典籍,做文化根基深厚的中华民族子孙。

三、《百部经典》解读人遴选的宣传功能

书目遴选出来后,遴选解读人就是《百部经典》编纂工作的重头戏了。选什么样的解读人,不仅关系到一部经典被解读的质量,还关系到向大众推出什么类型的学者,向大众传递学者的什么特质。2016年6月22日上午,景俊海同志到国家图书馆就《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调研,听取工作汇报,他要求,“编纂工作一要突出学术权威性,不断汇集最具学术权威性和影响力大的名家大师,不断吸收富有活力的中青年专家参与”^①,为解读人的遴选工作提出努力的方向。反复思考当前的学术界,考虑备选解读人与当前价值观之间的契合点,每一次编委会,对于每部典籍都需要做充分的前期调研,先遴选出多位候选解读人,再在编委会上一一讨论,直至最后确定。遴选解读人本身就是一种对学者的宣传,让大众看到我们推出什么样的学者,说到底,这是一种深度的社会价值和精神文明宣传。

首先,遴选出的解读人在学术上一定是权威的。遴选他们意味着让大家去了解真正在专业上有建树的专家,从而达到倡导追求真知、不断精进的宣传目的。读者读到书自然想去了解作者,等了解作者之后,发现是学界权威,是知名专家,是真正学有建树的人,心生向往之情,这才是一种对追求真知者的宣传。近年来,全社会都在倡导大众“追星”,不是追逐娱乐明星,而是追慕学术大家,追求在知识上不断探索并取得丰硕成果的耀眼明星。《百部经典》遴选出的学者,一定是在该典籍研究领域内的一流学者,其研究水平为学界公认。例如,《杜甫集》的解读人,经过前期大量充分地调研,遴选出4至5位在

^①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手册》,2016年6月28日。

杜甫研究领域内的一流学者，在第十三次编委会议上，与会编委充分讨论、商议，最终选定山东大学的张忠纲教授为解读人。张忠纲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就参加杜甫全集校注组，倾心于杜甫研究，著有《杜诗纵横探》《杜甫诗话六种校注》《杜甫诗选》《诗圣杜甫研究》等，主编《杜甫大辞典》《杜甫研究论集》等，几十年致力于杜甫研究，其研究水平为学界公认。2014年，凝聚了三代学者心血的《杜甫全集校注》终于在张忠纲先生的终审编统稿后面世，奠定了张忠纲先生在杜甫研究领域内最权威的地位，也成为我们邀请张忠纲先生担任《杜甫集》解读人最重要的原因。《百部经典》就是通过如此繁复的调研、讨论，遴选出最具学术权威性的学者，推介一批真正的学术大家走上前台，走到聚光灯下，达到宣传的目的。

其次，《百部经典》推出的解读人不仅学术水平为学界公认，还具有中华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德高望重，推介他们、宣传他们实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百部经典》遴选出的解读人，大都为年龄较大的专家，他们大多一生都在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具有很高的师德。《论语》的解读人钱逊先生，一生在高校任教，精研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学术界公认的大家耆宿。同时，他为人谦逊低调，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努力践行《论语》中的做人之道。《论语》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钱先生的学问和人品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李白集》的解读人郁贤皓先生，长期在高校教书育人，在学界享有盛誉。他对待书稿极其严谨认真，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李白集》出版后，普通大众开始去了解郁先生，了解到真正的学者风范，有读者在网站上搜索到刘运好教授对郁先生的描写：“谈到激动处，就会不自觉地站起来，脸上漾出自信而纯净的微笑，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似乎还夹着一个小虎牙。那样子，简直就像一任天真的老顽童。郁先生的学问常常让弟子五体投地，而他的神态又常常让弟子如沐春风。”说到郁先生的为师之道，刘运好教授又说：“因为我没有读过硕士，眼界狭隘，学问根底薄弱。有时向郁先生请教的问题非常浅薄无知，但郁先生从没有因我的浅薄而训斥过我，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①这篇描写郁先生的文章，成了普通读者了解郁先生性情的桥梁，点击量颇大。

再次，《百部经典》中的中青年学者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前沿，遴选出他们来担任解读人，彰显着对于中青年学者理想形象的正面宣传。山东大学王承略教授，爱人多年患病，他在医院、学校和家庭之间来回奔波，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 and 家务，以致自己也一度因腰疾住院，加上老家的母亲年事已高，需要经常回乡照顾，尽管如此，王教授还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保持充裕的精力，将教学和科研任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定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各项课题都平稳推进，个人多部书稿如期完成，也包括他所承担《百部经典》中的《后汉书》。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以坚毅、沉稳的姿态，坚定地承担起教书育人、家庭责任和社会文化传承的责任与重担。《百部经典》选择这样的中年学者，宣传他们不慕荣利，不求闻达，务实进取，努力积淀的沉稳力量。编委会还遴选出一批在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有70后、甚至80后的年轻学者，他们凭借专注的研究能力，年纪虽轻，但从学生时代就专研某部经典，可谓“十年磨一剑”，或专力《史通》，或精研《天工开物》，均取得不俗的成绩。推出年轻学者，因为他们勤奋、进取、不墨守成规，代表着活力与希望，代表着新的学术思维、学术潮流，潜藏着未来学术的方向与趋势，将这些富有活力的青年学者推向大众，饱含国家对于未来人才的期望，同时也是对于人才政策的宣传。

最后，《百部经典》遴选出的解读人都具有较好的社会普及性，他们的语言明白晓畅、平顺通达，是对新时期文风的宣传。在遴选解读人时，编委会就将文风、专家思想倾向当作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太过艰涩难懂的语言风格不选，太过油滑浮浅的语言也不能选；充满着怨怼戾气的行文不能要，阿谀逢迎

^① 刘运好：《郁贤皓：一流的学问，一等的性情》，人民政协网 <http://www.rmzxb.com.cn/c/2016-05-30/839994.shtml>。

的语言更不能要；只坚持一家之言不及其余的学术观点不能选，模棱两可不分主次的学术判断亦不可取。文笔平实、观点公允通达、行文流畅的语言是对理想文风的最好宣传。

四、《百部经典》撰稿和审订的宣传功能

在选定的解读人开始进入《百部经典》的撰稿环节时，编纂工作办公室会组织人员拜访解读人，实则是对编纂宗旨、编纂体例乃至文化政策的宣传。由前所述，我们知道，解读人是知名专家，在选定典籍的研究领域声名赫赫，只是《百部经典》有其独特的编纂体例，解读人解读的虽是他擅长的典籍，但又有全新的要求，这自然需要在一个新的编纂体例中重新开始工作。工作人员与解读人面谈，将编纂体例逐一向解读人解释，尤其是要将编纂这套书的时代要求和肩负着向大众宣传时代精神的重大使命传递给解读人。“2015年，先后赴清华大学、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沟通交流，与钱逊、郭齐勇、唐翼明、李山、王志远等知名专家学者面对面地交流，沟通编纂体例，交流编纂宗旨，达成共识”。^①可以看出，在编纂项目还在准备阶段时，这样一种学术交流性质的宣传活动就已开始了。

样稿撰写与审订同样是一种以学术为内核的宣传活动。经过面谈，解读人对编纂体例比较了解，就开始进入样稿撰写环节了。样稿撰写有具体的要求，要先写出导读的大纲，还要写出导读的样篇，通过此样篇呈出学术风格和行文风格，还要有选篇的目录和依据，借此了解解读人筛选的篇目是否符合编纂宗旨，还要有一篇关于原典的注释和点评，借此观察解读人对注释和点评体例是否落实。样篇提交后，一般会由熟悉编纂体例的编委来审订，编委会将自己的书面意见反馈给解读人，与其说是编委审订样稿，毋宁说是编委与解读人之间就编纂精神再做一次交流，而这个交流的重点，往往不是导读样篇里的内容学术性强不强，也不是原典的注释准确不准确，作为这部典籍的权威学者，对这些内容极为熟稔，交流的重点常常是在文笔是否足够平易近人，选篇是否为大众熟悉的篇章，点评是否能让读者耳目一新，导读中是否设置典籍的现实意义与价值。这个发生在编委与解读人之间、以学术为内核的宣传，在无形之中拉近了解读人与当下文化宣传的距离。

提交的初稿实则是蕴含着时代精神特色的文本。解读人往往功成名就，在《百部经典》框架下撰稿与他们之前所做的纯粹的学术研究并不相同，是要在文化宣传的方向上撰写一部面向大众的读本。之前是写给学者看的，这次要写给大众，不但要写给大众，还要将富含时代精神的内容传递给大众，这并非易事。他们在撰稿的过程中，有斟酌，有取舍，但最终都在思考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契合点，对于百余位解读人而言，撰稿过程就是他们自己主动思考主流价值观的过程，就是他们的自我思考与精神探索。与其说是《百部经典》的时代性和价值趋向对他们进行宣传，毋宁说是这批学术文化的中坚力量在撰稿的契机下，更深入地思考学术与文艺、学术与大众和学术与社会价值的关系。深受传统士大夫思想影响的当代学者，他们天然地具有“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使命与担当，在撰稿过程中，他们意识到自己向大众传播学术文化，感觉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价值。总之，这个撰稿过程实为深入而独特的宣传活动。

初稿完成后的审订是整个审订过程的核心。审订专家的遴选，是书稿审订的灵魂，既注重学术性，更注重其与时代精神的契合性，这才能审好书稿。遴选出的审订专家，拿着审订手册和工作手册，不单单以学术质量为唯一衡量的标准，还要检视书稿与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距离。审订专家由三人组成，其中有一位是曾审过样稿的编委，每部书都有两到三位审订专家，百部书共有两三百位专家，这是另一批权威学者加入《百部经典》的编纂工作。这些审订专家与解读人一起，交换着如何吸引大众的意见，共同探索着书稿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无疑就是在宣传时代精神，山东大学张可礼教授生前担任《曹操集》

^①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手册》，2016年5月24日。

审订组组长，他以85岁高龄，亲笔批阅，工整得当，汇总审订组意见，条分缕析，与解读人反复交流，多次沟通，共同探讨着怎样让传统文化更好地进入大众视野，很多像张可礼教授一样的审订专家，形成了建构和宣传时代精神的强大力量。

五、余论：《百部经典》推广活动的深度宣传

《百部经典》自2017年第一批10种书出版后，很快就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予以报道，而同时，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重要工作，在《百部经典》编纂工作办公室的统筹下，国家图书馆联合各部门推出了较深入的宣传活动。《百部经典》开展了走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共图书馆、高校、专业图书馆、艺术中心，街道和公园、市民中心，面向少儿等系列宣传推广活动。10月30日，国家图书馆策划了“此心光明——纪念王阳明诞辰550周年暨《百部经典》阅读推广特别活动”。通过“学习强国”平台、中新网、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中国青年报客户端、搜狐文化、喜马拉雅、抖音、快手、哔哩哔哩、新浪微博等多个平台进行线上直播，当天通过各直播平台在线观看本次活动的观众达320余万人次，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国家图书馆富有特色的宣传活动，彰显了颇有深度的宣传功能。

《百部经典》以学术性为核心，汇聚了全国众多学者，达到普通新闻宣传难以达到的深度宣传效果，又以普及性为目标，辐射到各个层次的读者，在新时期文化宣传工作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国家图书馆也在编纂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今后承担完成党和国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 谢明俊】